

# 郑振铎的古典小说研究方法

高邢生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郑振铎是20世纪初继胡适、鲁迅之后又一位古典小说研究的大家,他从最基本的文献搜集与整理做起,对小说文献的版本学、目录学、校勘与典藏都有卓越贡献。另外,他还尝试运用文学进化论、社会历史学等众多新方法,来解决小说研究中的诸多问题,并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其开创的研究方法值得后来人学习借鉴。

**关键词:**郑振铎;古典小说;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5)02-0076-04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5.02.021

## Zheng Zhenduo's Methods of Classical Novel Research

GAO Xing-she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After Lu Xun and Hu Shi, Zheng Zhenduo was a master in the research of classical novel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r edition, bibliography, collation and archiving. In addition, he tried to apply literary evolution, social history to solve problems in literary research, and made a lot of achievements. His research methods are still worth studying.

**Key Words:** Zheng Zhenduo; classical novel; research method

郑振铎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作家、学者、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同时也是一位古籍、版画、陶俑的收藏家。在文学研究方面,他涉及了古典诗词、戏曲、小说、弹词、平话等多个方面,并都有杰出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领域,他是继胡适、鲁迅之后又一位开拓者,将古典通俗小说研究作了进一步推进,并且在研究方法上有了新的开拓。

### 一、以文献的搜集整理为研究基础

在民国之前小说不属于正统文学的范畴,前辈学者没有对其进行过任何的整理工作。因此,小说研究的开创者们必须从文献的整理工作做起。文献整理工作涉及到版本、目录、校勘、典藏四个方面,这四方面郑振铎都有涉猎,而其贡献最大的应该是版本的梳理与文献的典藏。

在小说的版本研究上,郑振铎曾说:“研究中国小说的方向,不外‘史’的探讨与‘内容’的考索。但在开始研究的时候,必须先打定了一种基础:那便是关于小说本身的种种版本的与故事的变迁。”<sup>[1]203</sup>“‘版本’‘目录’的研究,虽不就是

‘学问’的本身,却是弄‘学问’的门径。”<sup>[1]204</sup>。作为藏书家的郑振铎非常注重小说的版本,据《西谛书目》记载,其所藏《水浒传》就多达22种本子,《西游记》多达16种本子,另外还有许多海外孤本,如《忠义水浒传》日本享保刊本、《游仙窟》日本影印醍醐寺藏永康三年抄本等。郑振铎对版本鉴别的功力很深,其鉴别日本得来的一套《西游记》时说:“就其版式及纸张看来,当是明代嘉隆间闽南书肆的刻本。其时代最迟似不能后于万历初元。”<sup>[2]247</sup>。胡适与鲁迅在小说研究中都是重视版本的,但胡适对版本的涉猎不够广泛全面,鲁迅更是承认:“我虽然草草编了一本《小说史略》,而家无储书,罕见旧刻,所用为资料的,几乎都是翻刻本、新印本,甚而至于石印本,序跋及撰人名,往往缺失,所以漏略错误,一定很多。”<sup>[3]385</sup>郑振铎在版本的搜集上所花费的精力远超胡适和鲁迅,因此他才能在小说文本先后源流等问题上说的更加准确透彻。

小说目录研究上,郑振铎曾说:“中国小说向没有人加

以系统的整理。”<sup>[4]306</sup>,虽然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对此做了初步梳理,但小说类的书目还没有,因此郑振铎“欲对中国小说作一番较有系统的工作”<sup>[2]306</sup>。1925年前后他在上海《鉴赏周刊》连续刊载了《中国小说提要》,先后介绍了《开辟演义》《五代平话》《新史奇观》《顺治过江》《铁冠图》《前七国志》《孙庞演义》等二十几部历史演义小说。1931年,郑振铎又在《明清二代的平话集》一书中为《清平山堂话本》《京本通俗小说》《秀谷春容》《古今小说喻世明言》等二十余种明清话本小说撰写了提要。另外,其撰写的《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记一九三三年间年的古籍发现》和《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发现记》,都对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文献存佚情况进行了考察和介绍。

在校勘上,郑振铎曾编辑出版了一些中国古典小说,而且在编辑时对小说文本做了认真校勘工作。1925年其编辑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该集收录了从唐代到清代的文言和平话短篇小说,对选录的小说进行了校勘和简注。其后又编辑出版了《醒世恒言》《警世通言》《水浒传全传》等小说,每一部书都是经过郑振铎精选底本,再参考其他版本认真校勘的。郑振铎的编辑出版工作,让中国古典小说以更真实完美的文本形式展现在大众读者面前。

在典藏上,郑振铎曾说:“我不是一个藏书家,我从来没有想到为藏书而藏书,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书,完全是为了

了自己当时的和将来的研究工作和研究计划所需要的。”<sup>[4]429</sup>但从其《求书目录》《劫中得书记》《劫中得书续记》等文字中可以看出,郑振铎对古籍的热衷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他可以不计后果的借贷买下《也是园古今杂剧》,“取到书的时候,简直比攻下一个名城,得到一个国家还要得意”<sup>[1]600</sup>。抗战期间,他又将“铁琴铜剑楼”“嘉业堂”“适园”等许多私人的藏书购得。正是其对收藏的热衷,许多难得的珍本古籍才得以保存下来,也使其成为了中外闻名的藏书家。据《西谛书目》记载,《子部·小说家类》收录小说94种,《集部·小说类》多达682部,其中明刊本就多达44种。在他逝世后,其夫人将家中所有藏书捐给国家,总数多达17224部,94441册。正是由于如此丰厚的藏书量,使其在戏曲、小说、诗词、弹词、版画等众多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

## 二、文学进化论的研究观念

郑振铎在《中国文学研究》序言中说:“三十多年来,我写了不少有关中国文学的论文,尤以有关的小说、戏曲研究的为多……且受了从西方输入的‘进化论’的影响,也想在文学研究方面运用这样的‘进化论’的观念。”<sup>[2]3</sup>他在1922年所撰写的《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一文中提倡莫尔顿的“近代的文学研究精神”,包括“文学统一的观察”“归纳的研究”和“文学进化的观念”。其前两者应该针对的是中国传统的鉴赏式、

评点式和臆测性的主观性研究,郑振铎反对鉴赏式、评点式的研究,他说:“鉴赏是随意的评论与谈话,心底的赞叹与直觉的评论,研究却非有一种原原本本的仔仔细细的考察与关照不可。”<sup>[4]274</sup>而评点式研究“有类于体骸一节一节被拆开了,更有类于一刀刀地把书本的肉都零碎地割下了”<sup>[2]277</sup>。为了改变传统鉴赏式、评点式的研究,郑振铎主张具有实证精神的“归纳的研究”。而“进化”的观念郑振铎解释为:“说明某事物一时期一时期的有机的演进或蜕变而已。”<sup>[1]11</sup>“把事物的真相显示出来,使人有了时代的正确的观念,使人明白每件东西都是时时随了环境之变异而在变动,有时是‘进化’,有时也许是在‘退化’。”<sup>[4]283</sup>从郑振铎的解释可以看出,以文学进化论的观念去研究文学,即是要用变化发展的观念去弄清某类文学或某类作品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形态、本来面目,以及其演进的过程。

郑振铎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中说:“文学史上的许多错误,自把进化的观念引到文学的研究上以后,不知更正了多少。”<sup>[4]284</sup>,他纠正了《三国》《水浒》《西游》都是元人流传下来的谬误,指出任何文学作品的成熟繁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必定有一个从萌芽到发展,再到成熟的过程。其举例说:“最初,在《搜神记》《世说新语》诸书中,原有不少的小说材料,然而其叙述是如何的简单。到了唐时,却有了唐人传奇继之而起,已渐渐有了描写,有了更婉曲的情绪了。到

回。在结构上,在描写的技术上,都有了显著的进化。”<sup>[4]283-284</sup>正是以这样的文学进化论观念为指导,郑振铎以版本整理为基础,以小说个案为研究对象,撰写出了《水浒传的演化》《三国志演义的演化》《西游记的演化》三篇文章,梳理出了三本古典名著的成熟过程,以及现存各版本之间的源流关系。

郑振铎的《水浒传的演化》对水浒故事的变迁和种种版本的关系作了详尽考察。他从《宣和遗事》和《三十六人赞》说起,找到水浒故事的萌芽,然后详尽考察了元杂剧中水浒戏,指出了新产生的故事情节,展现了水浒故事形成的过程。进而推测元末明初祖本《水浒传》的形态,并以水浒中主要故事情节的增减和文辞的变化为线索,考察了从罗本到郭本,再到余本、杨本的演变过程,期间还探讨了繁本与简本的关系问题,并最终以图表的形式将《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展现出来。《水浒传》故事的变迁及成书过程清晰了,各个版本的关系也非常清楚。相比胡适的《〈水浒传〉考证》,郑振铎的这篇文章将各种版本的源流关系解释的更加透彻。其《三国志演义的演化》《西游记的演化》和《岳传的演化》也都是运用文学进化论的观念来对个案作品进行详细地成书研究。

## 三、社会历史学的批评方法

郑振铎在胡适、鲁迅的小说史研究与考证研究之外,又

尝试了从社会历史学的视角,对小说文本的故事内容加以更深刻的阐释批评。他在《中国文学研究者向哪里去》中说:“惟有一点必须注意,就是一个伟大的作品的产生,不单只该赞颂那产生这作品的作家的天才,还该注意到这作品的产生的时代与环境,换言之,必须更注意到其所产生的社会的因素。”<sup>[4]302</sup>,他又在《中国文学的鸟瞰》中说:“中国的历史的和经济的社会的经济的情况也逐渐在变动着,且在背后支配着文学的进展。”<sup>[5]</sup>郑振铎意识到作为上层意识形态的文学艺术,是由各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从社会历史学角度去研究小说的故事文本,才能更好地解读小说得以产生的社会原因。

《谈〈金瓶梅〉词话》的前三部分《〈金瓶梅〉所表现的社会》《西门庆的一生》《〈金瓶梅〉为什么成为一部秽书》即是运用了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对《金瓶梅》故事内容所涉及的问题进行阐释评价。在此之前,对《金瓶梅》的评论主要是对小说人物和文笔的点评。郑振铎明确指出了《金瓶梅》是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地毫无忌憚地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西门庆发迹的一生即是古与今一般流氓或土豪的发迹历程,这种人的发迹充分揭露了政府的腐败与社会的黑暗。而《金瓶梅》创作中的淫秽描写部分,是由于受到了整体的时代环境与社会风气的影响,作家也不可能逃离社会独善其身。社会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可以解决传统考据学无法解决的,关

女间的三角恋爱剧中,通过分析元代商人、士子和妓女的真实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指出元代商业繁荣,商人地位空前提高,而士子的地位却一落千丈,在这种三角恋爱中妓女选择的往往是富商。穷困潦倒的士子们在现实中受到挫折,只好到戏剧虚拟的梦境中去获得解脱,于是产生了此种题材类型的剧目,而剧中富商多描写成恶人,而妓女最终与士子团圆。郑振铎清楚地看到“构成这种式样的三角恋的戏剧的,乃正是元这一代的那样的‘经济状况’在幕后决定着,支配着,指挥着,或导演着”<sup>[2]487</sup>。社会历史学的批评方法可以解决类似故事内容何以诞生的相关问题,在之后的小说研究中这种方法得到了学者们更广泛的应用。

#### 四、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

郑振铎具有学者、作家、翻译家、收藏家等多重身份,因此他的研究视野也更为开阔。在对中国文学进行研究的时候,他关注到了世界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因此他运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来解释一些中国的文学问题。他曾在《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中说:“在宋元之前,为什么中国没有发过戏剧和小说的大作品?为什么这些重要的作品,直到了宋元之时,才突然地如雨后的春笋般地纷纷产生……有一部分人用文学的眼光去研究印度的文学,尤其是他们的小说和戏曲,于是才发现他们的戏曲与小说,其题材与结构,与中国的

有惊人的共同之点。”<sup>[2]888</sup>郑振铎试着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来解释中国的小说与戏曲是如何产生的。他关注到的是印度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对于小说的产生,他明确地说:“小说起源于唐朝和尚讲唱的变文。”<sup>[3]27</sup>他认为佛教的传入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文言小说有极大影响,他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小说传统》中说:“到了六朝时期,佛教输入,佛教故事也随之传到中国来,许多印度故事都改头换面变成中国的故事了。这同时也刺激了中国故事的发展,产生了许多笑话和讽刺故事,及劝人信佛的宗教宣传故事。”<sup>[1]38</sup>其中《冤魂志》《冥祥记》和《续齐谐记》就是的典型例子。郑振铎认为,佛教对此类文言小说的影响有两个方面:第一是提供了许多故事材料,第二是引导作家向一条因果报应的故事路线上走。

除了研究印度佛教和文学对中国小说的影响外,郑振铎还关注中外同题材类型故事的比较研究。其在《民间故事的巧合与转变》中说:“相同的神话、故事与传说,每在各地流行着。譬如印度有一则故事,在欧洲也有着;欧洲中世纪的传说,在波斯也流行着;中国的一段神话,在西伯利亚也被人发现。”<sup>[4]265</sup>之后他以“所罗门”与“包拯”、“真友谊”与“杀狗劝夫”进行对比。在《老虎婆婆》中,他比较了“小红帽”类型故事上中外的人物设定、情节与结局的异同;在《中山狼故事之变异》中,将中国的“中山狼”故事与印度、高丽、挪威、法国等

除此之外,他还曾将《封神演义》与《伊利亚特》对比,将《三宝太监西洋记》与《奥德修斯》对比。只是他的这些中外比较研究都是点到为止,并没有进行更深入地探索。但在20世纪初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郑振铎的世界文学的视野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法是具有一定开创性的。

除此之外,郑振铎在传统的考证研究上也是非常有益建树的。在《西游记的演化》中,他考证了吴本《西游记》的刊刻时间,“这吴本《西游记》的全书,首有秣陵陈元之序,序末题‘时壬辰夏端四日也’,盖万历二十年所刊,刊地为金陵,刊者为金陵书贾世德堂唐氏……但今所见《西游记》,则当以此书为最古”<sup>[2]248</sup>。另外,他还通过各版本之间的详细比对,考证出吴本《西游记》在前,杨本是删改吴本的,纠正了鲁迅的错误判断。在《谈金瓶梅词话》中,通过考证序文和两个版本的异同,他断定“崇祯本确是经过一位不知名的杭州文人的大大笔削过的。《金瓶梅词话》才是原来的本来面目”<sup>[2]240</sup>。与胡适西学化的考证方式不同,郑振铎的考证更具中国传统的特点<sup>[6]</sup>。

综上所述,郑振铎继胡适、鲁迅之后,在小说研究领域继续不断开拓,他在传统文献学、考据学的基础上,尝试着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来解决中国古典小说中的诸多复杂问题,并且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他不断从方法论上指导后来学者

应该如何去做,并且身先士卒地去努力尝试,正如谢超凡等所评的那样:“无论文献的发掘蒐集,还是文本的阐释评鹭,郑振铎都更称得上是小说研究的纯正典范。”<sup>[7]</sup>正因如此,他的研究方法也更值得我们去学习。

### 参考文献:

- [1] 郑振铎. 郑振铎文集:第七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 [2] 郑振铎. 郑振铎文集:第五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 [3] 鲁迅. 鲁迅全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4] 郑振铎. 郑振铎文集:第六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 [5] 郑振铎.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15.
- [6] 王光和. 论胡适古典小说考证的西学背景[J]. 西华大学学报,2012,31(6):18-23.
- [7] 谢超凡,欧阳健. 论郑振铎在二十世纪小说研究的重要地位[J]. 文津流觞(纪念郑振铎诞辰一一〇周年专号),2008(12):185-190.

(责任编辑:李秀荣)

(上接第72页)

### (三)“文章全藉改窜”

唐彪在《读书作文谱》中对读书作文之法的论述,可谓全面而详细,除了前面提到的“静”字诀、“熟”字诀之外,还有“文章惟多做始能精熟”“文章全藉改窜”“作文精研一法”“作文上乘工夫”等,无不是从“机窍论”出发得出的心法要诀。

唐彪对改窜之法非常重视。他说:“文章最难落笔便佳。如欧阳永叔为文,既成,书而粘之于壁,朝夕观览。有改而仅存其半者,有改而复改,与原本无一字存者。……乃知文章全藉改窜也。”<sup>[2]3462</sup> 欧阳修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章

自己的作品,有了主观的偏执,这种偏执就蒙蔽了他的视野,使他看不出文章问题所在。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进行冷处理,“俟迟数月”,取出改窜。这样一方面去除了主体的自我妄执蒙蔽,以陌生的眼光观他人之文,自然历历在目,无所隐遁;另一方面,在这冷处理的数月之中,“机窍”可能正在不知不觉地生发酝酿,取出重看就可能起到触发“机窍”活动的作用,这时着手改窜,就可能“有一佳文出焉”了。唐彪自称此一妙境,不是所有人都能领悟,可见他在这一方面的研究,的确是非常有心得的。

### 四、结语

按照这种思想,古人认为思想、灵感、文章是在一定状态下从“窍”中生发而出的。这种状态虽非意志所能控制,但也是能在一定条件下达到的。这种理论与现代西方非主体性写作思想有相通之处,不过显然前者比后者更为成熟,也能相当令人满意地解释一些文学、写作现象,但目前这一理论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 参考文献:

- [1] 刘勰. 文心雕龙·神思[M]//周振甫. 文心雕龙注释.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95.
- [2] 唐彪. 读书作文谱[M]//王水照. 历代文话.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 [3] 朱熹. 朱子语类[M]//黎靖德. 朱子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19.

(责任编辑:白丽娟)

而知了。这个事例是很具说服力的。

他又在理论上思考了作文“全藉改窜”的道理。他说:“古人虽云文章多做,则疵病不待人指摘,而自能知之。然当其甫做就时,疵病亦不能自见。惟过数月始能知之。……俟迟数月取出一观,妍丑了然于心,改之自易。”<sup>[2]3463</sup>

而下文所云“作文有精研之法”,实与改窜之法相通。他说:“人于一日之间,文或不佳,必不可生退怠心,更不可将所作毁弃。迟数月,仍以其题再作,有一篇未是之文,反触其机,即有一佳文出焉。此中妙境,惟亲阅历者乃能知也。”<sup>[2]3463</sup>

“反触其机,佳文出焉”这样的说法,提示我们这里所说的改窜、精研之法,其实还是以“机窍论”为根基。“机窍”的生发,有一定的条件机缘,既非主体意识所能控制,也不是时时刻刻都能敞开,所以主体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即如海德格尔所说“静听存在深渊的寂静之音”。因此,当机缘未至,“机窍”未开之时,所作之文可能就不佳;或者作文的当时并不能觉察不佳,这是因为作文其实本非主体所为,而是从“机窍”中自然流出,但是在“机窍”不通的情况下,主体误以为是